

田野调查实录

民族调查回忆

主 编 郝时远
副主编 任一飞 华祖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田野调查实录

——民族调查回忆

主 编 郝时远

副主编 任一飞 华祖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郝时远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9

(国庆五十周年献礼书)

ISBN 7-80149-195-5

I . 田… II . 郝… III . 民族调查 - 中国 - 文集

IV . D63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130 号

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



主 编: 郝时远

责任编辑: 刘 辉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东远先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8.875

字 数: 47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4000

ISBN 7 - 80149 - 195 - 5/C · 029

定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前 言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我给它起名为《田野调查实录》。当读完它并在计算机屏幕上敲出“前言”二字后，我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她所展现的境界加重了我不自信的思绪，使我不知该如何完成这一身轻位重的主编责任。

这部书稿的作者大都是中国民族研究界年事已高的专家学者，年纪大的达87岁，个别年纪轻的也临近耳顺之年，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他们中有我熟悉的，也有我未曾谋面的。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虽然他们只是当时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数以千计学人中的极少数，但是，他们曾经历过的那些难以忘怀的事情却是他们及其同事（包括很多已经去世的）共同享有的。当他们开始在祖国大地的山川雪域、森林草原、大漠戈壁探究中国多民族国情实际时，我不过是置身襁褓的婴儿。时过境迁，虽然今天从事民族研究的中青年学人，谁都知道50年代的民族调查，谁都知道“三套丛书”或“五套丛书”，谁都会从这本书的作者中找到自己所熟悉或知道的名字并联想到他们的学术著述。但是，我敢说，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民族工作者学术经历中的艰辛过程及其中包含的思想、感情和献身精神。

当我硬着头皮憋出上述文字后，似乎找到了继续下去的思路。我想，要向读者说明的恐怕主要是为什么提出编这样一本书。

从1993年开始，酝酿多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作为院级“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开始由民族研究所启动实施。当然，这一项目的酝酿和实施，是着眼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少数民族的现状与发展。但是，它的历史基础、参照对象和调查线索却依托于从建国初开始并延续到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有些调查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展的）。毫无疑问，那次民族调查的成果不仅对党和国家把握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际、进行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十分丰厚的资料和规模庞大的著述，促进了中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滋养了中国民族研究学界的后继者。事实上，新中国的民族研究事业，正是在那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族调查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的民族研究队伍，正是在那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族调查过程中锻炼和培养起来的。

1996年底，当我修改完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新巴尔虎右旗·蒙古族卷》的前言之后，对其中涉及调查过程到完成书稿期间的精力投入、心力艰辛和知识不足的感慨却意犹未尽。调查研究绝非易事，民族调查（或称田野调查）则更加艰难。这使我不得不想到50年代民族调查时大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时的情景。然而这些情景对我来说是抽象的、模糊的，我无法身临其境地去感觉它。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90年代以来开展民族调查工作、特别是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时，参加调查的人员基本上是80年代以后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人。他们大都缺乏民族调查的经历。这大概也是整个民族研究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些年来，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颇盛，“短、平、快”

的效益追求助长了抄编甚至剽窃之类的现象，深入实际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在一些人听来似乎已成为老生常谈甚至不足挂齿。当时，所里一位年轻同志谈到在很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中碰到外国的人类学工作者在那里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和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民族研究工作者为什么不能这样？这的确是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今的田野工作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倍，可如今的民族研究工作者的田野工作经历就普遍情况而言却较之五六十年代同龄的民族研究工作者不知减少了多少倍。当然，调研条件改善本身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缩短调研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调研对象与任务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学科知识的综合而变得更加多样、更加艰难。此外，从人类学、民族学诞生以来，卓有成就的中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都是通过长期、扎实的田野实证基础来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这一学科特点至今未变，今后也不会改变。所以，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和学术队伍的成长必须依托于田野。毫无疑问，目前普遍存在的经费困难和调研开支增多之类的问题，是制约开展田野工作的重要原因。不过，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不足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民族研究所对新人所工作的科研业务人员都要进行入所教育，其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内容就是继承和发扬 50 年代民族调查的优良学风，要求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同志把田野调查作为自己成就学术的基本功。可这些优良学风是什么？对此我们缺乏认真地总结。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不可能深刻地感觉它。而当我们能够深刻地感觉它时，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

还有一个想法是关于专家学者成就事业过程中在学术著述中难以反映的心路历程问题。作为学术著述，是反映科学工作者理论修养、专业知识、资料基础、思辨能力、写作水平、研究手段

和治学态度的综合成果。但是，他们获得或达到这一综合水准所付出的努力通常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思想过程、经历事物、乃至生活琐事之类。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虽然与文学创作工作者有类似的工作特点，但是其成果的传播和影响面却要比文学作品小得多，人们可能会关注一个知名作家的创作过程如同对待明星大腕的生活轶事一般，但是难得有人会对专家学者的学术经历感兴趣，如果有也基本上是学界同仁。事实上，在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经历中，田野工作的实践是十分丰富和引人的。因为，他们所去的很多地方和所接触的调查对象，都是其他人不容易去或不容易接触到的。这些经历中所反映的工作过程和调研心得，不仅给后人留下诸多献身事业的精神启示，而且也给后人留下诸多继续耕耘的工作线索。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初出茅庐的实践是如何度过的，他们风华正茂的岁月是怎样奉献的，他们治学有成的造诣是怎样达到的，等等。同时，通过他们对那一段艰苦而可贵经历的记述，人们还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到当时我国民族工作开展和深入的过程，了解到当时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到他们所提及的至今默默无闻而当时同样献身于民族调查工作的那些向导、翻译、解放军战士、公安人员和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等等。我想，无论对于从事民族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还是对于其他行业的读者来说，人们都会从这样的回忆中得到启示和知识，开卷有益、甚至获益匪浅。

上述想法，是我提出编这本书的意图。作为民族研究学界的后生晚辈，对前人几十年前所经历的辉煌业绩和他们为中国民族研究事业作出的贡献，我缺乏全面评说的能力，但是我愿意创造条件把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笔财富，是充满思想感情、奋斗精神、治学态度和学术价值的无形财富。她不仅应该留给后人，而且应该成为后人接续的阶梯。学人不仅应该

为社会留下科学的成果，也应该为社会留下治学的经历。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在关注政治人物传记、喜欢明星大腕传略的同时，各种人生经历的著述正在纷纷面世，学人溯源访古幽情、田野考察经历的著述亦方兴未艾。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人的经历是纷然杂陈的。在多样化日益成为社会生活发展的主流时，人们的需求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必然呈现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在人类社会很快就要迈入第三个千年纪之际，回首往事是为了迎接未来。50年代初开始的民族调查很快就要距离我们半个世纪了，“五十而知天命”。在世界上，中国不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在建国之初就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这在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中却是十分少见的。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调查工作难以避免地受到主客观条件不足的影响，如学科理论尚不成熟、研究手段比较落后，加之田野工作的环境困难重重以及支持在这种环境中顺利开展工作的物质条件欠缺，等等。所以，正如本书作者们在回顾那段经历时所提到的一样，50年代大调查形成的丰厚而宝贵的资料和著述中存在着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与不足。但是，它们所记录的资料、所反映的现实、所作出的分析无疑都是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因为它们来源于实践、依托于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历史，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圣经”，我们留给后人的著述，其生命力是否比前人留给我们的成果更长？也许有人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至少我现在不敢有这样的自信。当然，学术事业要不断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产出优秀成果、传世之作是学人的追求，也是学人的责任。但是，实现超越前人，首先是了解前人。你可以用更加成熟的理论和更加先进的方法去解释事物、纠正前人的认识偏差，但是你无法脱离前人为你搭就的阶梯。只有通过这个阶梯，你才能实现站在巨人肩

膀上的意愿。如果你是一个立志为中国民族研究事业奋斗终身的学人，你面前那一代学人群可贵的献身精神就是你攀登学术高峰的动力，他们丰厚的学术积累是你攀登学术高峰的阶梯，他们艰辛的田野实践是你攀登学术高峰的起点。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后人应该从50年代民族调查中感悟的“天命”。

一篇前言写到这个篇幅应该说是够长了，可是我仍然感到有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已不是开始那种面对老一代学人可贵经历而自感无力客观评价的压力，而是来自上文所说——回首往事是为了迎接未来。他们在文章中大都提到了对那一段经历的珍惜和无悔无怨的心境，也多有人提及了他们对后学的希望。我们应该从中感到责任的重大。中国的民族研究事业已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民族研究机构和队伍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民族研究各学科在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借鉴、研究手段更新和成果载体多样性等方面不断发展，民族研究各学科内部的联系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渗透不断加强，综合研究的特点日益突出，面临的研究课题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国家推进我国民族问题解决程度的进程越来越密切，实践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在1997年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即体现了这种需要。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对中国多民族国情实际的认识也需要在前人提供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出发、从各个少数民族所处的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去调查研究、观察思考、著书立说；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前人的学术成就、发扬前人的奋斗精神、发挥我们的创新能力，推动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要向前人学习投身田野、勤奋耕耘的精神和学风，同时我们也要把中国民族研究的田野工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另一本或一批反映中青年学人成长于田野经历的著述面世。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组稿和编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任一飞、华祖根两位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以和作者们同代人的感情与理解投入了这项工作。同时，作为编者，我们感谢各位作者，他们打开记忆的大门和尘封已久的日记，感谢他们向民族研究学界的后人和世人提供治学的启示，感谢他们和与他们共同奋斗过的那一代学人。

谨以此书铭记所有参加过 50 年代民族调查的前辈学人及其合作者为中国民族研究事业和民族工作作出的贡献！

郝时远

1998 年 4 月 5 日于北京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同志摄影留念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合影



福建少数民族调查组全体合影



风餐露宿进墨脱



西藏察隅傜人语言调查



整理植物标本



与基诺族群众共舞



帐篷中的忙碌



裕固族语言调查



被授予“拉枯族
名誉公民”称号的金
有景（左二）在授予
仪式后与澜沧县领导
合影（1989.8.15）



调查西藏人权状况



西藏当雄草原牧区调查